



“没有群众”： 胡庶华与战时西北大学校政^{*}

陈 钊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地处陕南城固县，日军鞭长莫及，首任校长胡庶华面对的主要威胁不是战争，而是大学原有权力格局的挑战。面对复杂的局面，毫无“群众”基础的胡庶华周旋于国民党各派系、三青团、中共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一面通过大力扶持三青团、争取国民党中的非CC系力量和示好中共及其外围组织等措施，争取已有“群众”；一面调来乡党、旧部、学生，扩大“群众”基础。在着手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的同时，胡庶华也尽力争取陈立夫、朱家骅等党国要员的支持。胡庶华以政治家的手段推行校政，努力两年，最终还是被西北大学旧人依托国民党CC系力量控制的区党部挤出学校。校缘与党派力量的结合成为左右西大校政走向的关键因素，区党部沦为争夺校政控制权的工具。

关键词 胡庶华 刘拓 西北大学 党争

近年来，对民国时期大学、大学校长的研究不断升温，其中尤其关注蔡元培、梅贻琦等“成功者”或他们“成功”的一面。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开始雄心勃勃而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去的高校校长实不在少数，国立西北大学首任校长胡庶华即是一例。^① 对这些人物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民国时期大学治理的另一面。

1938—1940年，胡庶华先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行文方便，下文有时简称为“西北联大”或“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后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② 在西北联合大学任职期间，适逢该校改组为西北大学，胡在改组中得到陈立夫赏识，成功获任西北大学第一任校长。然而就职刚刚一年，胡

^{*} 本文写作得到南京理工大学特色应用型文科建设计划（AE91319/006）的资助，亦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共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研究”（30916013130）的阶段性成果。

^① 抗战前陕西即有土生土长的“国立西北大学”，但几经改组后于1935年8月无疾而终。参见李永森、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史稿上卷（1902—1949）》（修订本），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西北大学校方1947年出版并呈送教育部的《国立西北大学概况》以1939年为西北大学起点，故下文讲的“第一任”“首任”校长即从1939年算起。参见《国立西北大学概况》，国立西北大学1947年编印。

^② 1938年4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同年6月29日第一次改组，工学院、农学院剥离，1939年8月8日第二次改组，师范学院、医学院独立，剩余部分合组为国立西北大学。





庶华便狼狈离开。本文充分利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相关档案,试图还原胡庶华在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渡过的两年时光,从一个侧面展现战时大学校长在校内外种种力量掣肘下的艰难办学历程。^①

一、空降常委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教育部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合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六个学院。^② 西安临时大学采取委员会制,由教育部聘徐诵明(北平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副院长)、陈剑脩(中央大学教务长)、童冠贤(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周伯敏(陕西省教育厅厅长)、臧启芳(东北大学校长)、辛树帜(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为筹备委员会委员^③,徐诵明、李蒸、李书田、李书华、陈剑脩任常务委员^④,主持校政。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电令已迁到陕南城固县的西安临时大学改称西北联合大学。^⑤ 由于原常委李书华一直未上任,陈剑脩也于6月就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因此,1938年上半年学期结束时,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中只剩下徐诵明、李蒸、李书田三人。

1938年6月29日,教育部突来一电,令成立才两个多月的西北联合大学改组,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组成国立西北工学院,李书田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成国立西北农学院,辛树帜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改组后的西北联合大学只剩下文理、法商、医学、教育四学院。^⑥ 7月22日,教育部将联大筹备委员会改组为校务委员会。恰在此前3天,蒋介石致电陈立夫,称赞刚刚辞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在学术界颇负时誉”,希望“设法酌予聘用”。^⑦ 陈立夫当机立断,派胡庶华到西北联合大学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常委,与徐

① 郭仁成的《胡庶华》(《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编:《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5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比较客观全面地论述了胡庶华的一生。李永森、姚远主编的《西北大学史稿上卷(1902—1949)》(修订本)对胡庶华也有评述(第249、274—275页)。王奇生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研究了国民党如何通过学术活动巩固、发展基层组织(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胡国台、蒋宝麟论述了大学校园内的国共斗争[吴国泰(胡国台):《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校园斗争》,萧秋等:《国外学者评中国共产党》,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2年版;蒋宝麟:《中央大学的国民党组织与国共斗争(1927—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3期,2011年9月]。桑兵系统论述了抗战时期大学中的国民党派系争斗及其影响(桑兵:《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何方昱探讨了地方党部对浙江大学的深度介入(何方昱:《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校政”为核心概念,进一步讨论大学校长如何在复杂的校内外党争中进行机构调整、院系主任安排、教员聘用,维护大学校政的正常运行。此处的“党争”有三层含义:国共之争、国民党内派系之争、朋党之争。

②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③ 《聘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由》(1937年9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211,第26页。

④ 《国立西北大学概况》,第2页。

⑤ 重庆《教育部公报》第10卷第4、5、6期合刊,1938年6月30日,第49页。

⑥ 7月21日,教育部令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师范学院预算单列,设教务主任、主任导师、事务主任各1人,相对独立于西北联大。参见《教育部汉艳电一件》(1938年6月29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5/306,第1页;《令知自下年度起各院系调整办法》(1938年7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5/306,第5页;《为发师范学[院]规程及国立中央大学等校设立师范学院办法给西北联大训令》(1938年7月27日),甘肃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档案,33/001/0002/0002,第6—10页。

⑦ 《蒋中正致陈立夫电》(1938年7月19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01/0001,第16页。





诵明、李蒸并列。^① 辞去重庆大学校长一职本非胡庶华所愿^②,因此才会致函蒋介石,“恳另行指派工作”。^③ 不料新职位居然只是三常委之一,在西北联合大学没什么根基的胡庶华只有与教育部尽力配合,才有可能站住脚。

胡庶华(1886—1963),湖南攸县人,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获冶金工程师学位。他曾先后担任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兼事务主任、国立武昌大学教授兼总务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国立同济大学、省立湖南大学、省立重庆大学校长。^④ 虽然胡庶华大多数时间在南方学习、任职,但他1932年任同济大学校长期间,曾率“陕西实业考察团”南组于八九月赴陕南安康、城固、南郑等地考察30余日,不仅详细调查了当地的工农业资源,还沿路参观了张骞墓、萧何堰等古迹。^⑤ 1936年,胡又与李书田同在中国工程师学会任董事^⑥,因此对西北联合大学不算完全陌生,对城固县也还有所了解。

1938年8月,西北联合大学新科常委胡庶华只身到达城固县城,开始人生中一段特殊的旅程。刚到西北联大的胡庶华,给人的印象是正当盛年,干劲十足,“天天起身很早夹上大皮包去办公室”。^⑦ 初来乍到,胡庶华虽然人地生疏,但到底是执掌过数所大学的老资格校长,很快就理出插手校政的思路。9月16日,胡庶华在西北联合大学第40次常委会上提议裁撤总务处,设立训导处,并自兼训导处主任。

胡庶华一贯重视学生训导,还在第一次执掌湖南大学时,就曾向学生提出《十条告戒》:

(一)刻苦耐劳以锻炼身体,(二)博闻强识以充足智力,(三)严守秩序以健全组织,(四)诚实不欺以树立信用,(五)坦白率真以表示磊落,(六)见义勇为以发扬正气,(七)遇事认真

① 《陈立夫致蒋中正电》(1938年7月2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01/0001,第15页;《教育部致西北联大电》(1938年7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5/306,第17页。

② 胡庶华系原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礼聘而来,1938年1月刘突然辞世后,胡失去靠山,重庆大学经费顿成问题,不得不于1938年6月25日提出辞职,以向四川省政府施加压力。不料代理省政府主席的王缙绪很快批准其辞呈,迅速调四川大学化学系主任曹四勿执掌重大。重大师生发起大规模的“挽胡拒曹”运动。在师生的压力下,王缙绪同意挽留胡,却又限胡三日内回复,过期不候,令局外人、时在重庆的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也看不下去,斥之为“川人花样殊为复杂”。参见重庆大学校史编写组编《重庆大学校史》上册,重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53页;《胡庶华致王缙绪电》(1938年6月25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大学档案,012000010003800000074000;《顾毓琇致陈立夫函》(1938年7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1709,第229页。卸任教育部部长不久的王世杰认为,胡庶华的离职与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胡“过于联络中央西迁之学校或予以特殊便利”,令四川地方势力不满有关。考虑到胡庶华1938年4月17日才陪王世杰游过重庆北碚,王的这一猜测应有所本。参见王世杰著,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4月17日、8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110、134页。诸多材料均证明胡离开重庆大学实属无奈。

③ 《蒋中正致陈立夫电》(1938年7月19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01/0001,第16页。

④ 《公务员任用审查表》(1939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46页。胡庶华在另一份表格中填的学历是“工程师”。参见《现任公务员资格审查表》(1935年4月8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大学档案,01200001000380000001000。

⑤ 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出版地不详,1933年印,第40—50页。何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是“陕西实业考察团”南组成员。

⑥ 何志平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⑦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3年编印,第91页。这份文件是1941年6月进入陕西关中边区的西北大学学生党员余士铭、苏农观、陆玉菊、伍诗绥在7月10日、11日两次集体谈话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8月,第二批到达边区的马介云、胡宗瑜、陈超平又作了补充。严格来说,这份史料系事后之回忆而非档案,故在一些人名、事件细节上不免有误,但因为所述人、事距材料形成日期不远,再证诸档案,总体而言是可靠的。





以矫除敷衍,(八)爱众亲仁以团结群众,(九)自奉俭朴以砥砺廉隅,(十)轻财远色以高尚志趣。^①

到西北联合大学后,胡对学生训导还是抓得很紧,对升旗、读《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相当热心,每天早早起来,“到各宿舍去喊”学生参加升旗仪式^②,因此还得了一个“升旗委员”的诨名。^③

新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恰恰也极为重视学生训导。1938年3月28日,教育部颁发《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4月11日,西北联大收到该件和《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时^④,起初并未意识到这个纲要的分量,直到5月下旬徐诵明、陈剑脩赴武汉向陈立夫请示工作,发现陈对实施导师制极为重视,才专门给学校发回电报,督促校方加快落实。

胡庶华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向第40次常委会提出《请增设训导处案》,称“教育最高当局对于青年之严格训练早已三令五申,本校负有发展西北教育、文化及建设之使命,对于学生的思想、言行、学业以及身心摄卫,尤宜切实训导”。但西北联合大学“现有之军训组属于教务处,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属于常务委员会,事权既不统一,执行自属困难”,因此,为统一事权、加强训导效能计,“应即增设训导处”。同时,胡庶华观察到,总务处虽下辖庶务、会计、斋务三组及卫生室,但自医学院、法商学院添设事务室,师范学院另设事务主任后,“庶务组之事务已减少大半”,而且会计组已据教育部令“改为有独立性之会计室”,总务处职能大幅缩水,已无存在的必要,故同时向常委会提出《请裁撤总务处案》。^⑤

胡庶华提出两案的时机恰到好处。此时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已相对独立,原联大总务处处长袁敦礼也已就师范学院教务主任之职,所以裁撤总务处不致引起袁的反对。而师范学院相对独立后,北平大学出身的徐诵明也不希望北平师范大学的老资格教授袁敦礼再插手西北联合大学的校务,故对于胡的提案,徐只会赞成不会反对,因此,两个提案均获通过。西北联合大学原在校务委员之下设秘书、教务、总务三处,至此一变而为秘书、教务、训导三处,除秘书处主任是湖南同乡黎锦熙外,胡庶华还自兼训导处主任,下辖主任导师会、军训组、斋务组,初步在联大立住脚跟。^⑥这也是全国专科以上学校首设训导处。^⑦此时,距胡庶华到西北联合大学才一个月。这是胡庶华巩固权力基础的第一步。

他的第二步是通过物理系教授杨立奎,与校内国民党复兴系沟通关系。西北联合大学的国民

① 郭仁成:《胡庶华》,《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5卷,第66页。

②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12、146页。

③ 《张貽惠等告胡校长》(1940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91页。

④ 《制定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颁发施行,令切实遵照办理具报由》(1938年3月3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205,第106页。

⑤ 《请增设训导处案》(原件无日期)、《请裁撤总务处案》(原件无日期),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5/445,第55—56页。

⑥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纪录》(1938年9月16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67、70页。第42次常委会将“主任导师会”改名为“导师会”,参见《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纪录》(1938年10月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76页。

⑦ 这一机构的创设对民国时期的大学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仿西北联大例,均设训导处。同年5月16日,教育部颁发《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要求大学统一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此后,训导处与教务处、总务处并列,成为大学治理结构中的三大处,一直到国民党去台。参见《本大学校本部本学年第二学期第二次纪念周纪录》,《西北联大校刊》第15期,1939年5月1日,第6页;教育部编:《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报告》,1939年,第30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699页。





党复兴系骨干多为军事教官,如军训组主任李冰、教官王佐强。胡除了通过军训组控制复兴系外,还想方设法把杨立奎拉在身边,以图抓住师生中的复兴系。杨立奎是西北联合大学少数复兴系教授之一,更是极少数愿意公开为国民党辩护的教授。还在北平时,杨即因率领新学联(北平学生联合会)与左翼学生主持的旧学联(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相抗衡而闻名学界。^① 1938年4月底5月初,杨被委任为西北联合大学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②,负责学生贷金发放、校园社团管理等与学生日常生活有关的工作。1938年5月1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直属西北联合大学区党部成立后^③,杨又在幕后指导,在国民党党员特别是有复兴系背景的党员学生中声望颇高。^④ 正是注意到杨的地位,胡庶华设立训导处后,在其下置主任导师会,委杨立奎为主任导师,但凡胡庶华外出,必由杨代理其训导处主任(1939年5月后改称训导长)职务。^⑤

在把复兴系纳入麾下的同时,胡庶华也着意经营与CC系的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配合CC系干将张北海,整顿法商学院。

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的前身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该院在抗战前以左翼学者云集、中共活动频繁而著名。从1931年起,陈豹隐、章友江、侯外庐、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曹靖华等左翼教员陆续在此任教,引起国民党的高度注意。^⑥ 北平大学南迁后,法商学院左翼教授虽只来了沈志远、章友江、曹靖华等数人,却未减淡学院的左倾氛围。性情豪爽的章友江很快成为左翼师生的中心。章不仅想办法把法商学院的左翼教员重新聚拢在一起^⑦,还公开指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的活动。^⑧ 以法商学院学生为骨干的中共联大党支部不仅控制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起的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在联大的学生支会,还主导了校内外各项活动。国民党籍师生虽对此恨之入骨,却因得不到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徐诵明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的支持而一时无法扭转局面。^⑨

① 中大荣:《记北平新学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乔家才:《浩然集(四)——海隅丛谈》,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507页。

②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纪录》(1938年5月1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16页。

③ 该区党部成立后,陕西省党部指定牛传钦、赵金铭、吕明甫、邵辅周、邓运生5名学生为党部指导委员,除赵金铭来自北平大学以外,其余4人皆来自北平师范大学,与杨立奎同属一校,邓运生还曾在杨的直接指导下,从事“新学联”的领导工作。参见《关于请求发给房屋事宜给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古路坝分院院务委员会的公函及西北联大青年团的成立宣言》(1938年5月8日,原件无年份,此系引者据同卷该区党部致文理、教、工分院便函所载日期判断),甘肃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档案,33/001/0461,第16页;《为呈请彻底整顿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正青年思想以利党前途事由》(1938年8月1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58页。

④ 杨立奎虽在区党部没有头衔,但以其资历、胆识成为1938年上半年法商学院院长更迭风波中国民党籍学生的灵魂人物,指导西北联大区党部力挺政经系主任尹文敬竞选院长一职。参见《西北联大发生驱逐反动教授风潮之前因后果》,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09—213页;《温广汉致朱家骅函》(1939年1月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学校党务:西北联合大学,301/01/06/340,第4页。

⑤ 胡、杨关系一直很好,1939年8月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后,胡庶华还致电陈立夫力荐杨立奎出任学院主任导师。参见《胡庶华致陈立夫电》(教育部1939年8月23日收电),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8/140.14-01/0001,第95页。

⑥ 《请转令教育部撤换北平各大学反动教授案》(1936年8月1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5.3/18.24。在中央组织部开列的15名“反动”教授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就占了7人。

⑦ 季陶达:《我在西大的日子里》,《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1辑,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1987年编印,第65—67页。

⑧ 李昌伦:《抗战初期西北联大学生革命斗争片断回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前后和抗战初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页。

⑨ 《职务分配一览》,《西安临大校刊》第8期,1938年2月7日,第12页;《为呈请彻底整顿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正青年思想以利党前途事由》(1938年8月1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55—156页。





1938年11月,在胡庶华的力挺下,张北海接替支持左翼师生活动的许寿裳,出任法商学院院长,拉开整顿法商学院的帷幕。11月5日,教育部电派张北海为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①,同时密电校方,要求聘其为法商学院院长,以“整理法商学院”。^②徐诵明躲到西北联大南郑办事处,拖着不办。胡庶华“多方设法”争取到代行李蒸常委职务的黎锦熙的支持,使第48次常务委员会得以于11月12日移师南郑办事处召开。然而近在咫尺的徐诵明仍不出席,而是派教务处主任张貽惠代为参加。胡庶华又“几经奔说”,常委会最终议决张北海接替许寿裳,出任法商学院院长。^③张北海长期追随陈立夫,作风强悍^④,又曾任北平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CC系外围组织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董事,长驻平津,与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大学教授相熟。另外,张因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所以与左翼文人斗争经验丰富,实为整顿法商学院的理想人选。张北海就任后马上整顿法商学院。11月30日召开的西北联大第51次常务委员会,徐诵明、李蒸均未出席^⑤,而分别以张貽惠、黎锦熙代行常委职务,三大常委只有胡庶华亲自参加,无形中便成为常委会的中心。首度列席会议的张北海提出解聘商学系教授刘及辰、讲师张云青和政经系副教授韩幽桐等“无名小卒”,均获顺利通过。沈志远致函常委会主动请辞,张貽惠、黎锦熙主张挽留,但经“张院长力争”,又兼胡庶华“主张公道”^⑥,常委会最终还是准许沈辞职。到1939年1月底2月初,张北海又陆续迫使包括曹靖华、章友江在内的近10名教员离开西北联大。^⑦在胡庶华的配合下,张北海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法商学院“一切均入常规,秩序安如磐石”,国民党籍学生不禁欢呼“张北海院长扬帆于法商”。^⑧因此之故,大陆出版的西北大学校友回忆录多将胡庶华列入CC系,痛斥胡与张北海沆瀣一气,为祸西北联合大学。^⑨

胡庶华之所以纵容张北海为所欲为,主要还是想借张之力,稳住校内的CC系师生,打通与陈立夫的沟通渠道,坐稳西北联大常委的位子。胡庶华是个“有野心”的人。此前执掌湖南大学、重

① 《加派张北海先生为校务委员》,《西北联大校刊》第6期,1938年12月1日,第6页。

② 许世瑛:《先君许寿裳年谱》,北冈正子等编:《许寿裳日记(1940—1948)》,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4页。

③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组情况报告书》(1939年3月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40—241页;《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纪录》(1938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92页;《胡庶华致陈立夫电》(1938年11月1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01/0001,第43页。

④ 曾在教育部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任职的梁实秋评论张北海道:“张北海先生是部里的一位干员,任何地方学校有纠纷,总是派他去大刀阔斧的彻底解决,而能不辱使命。”参见梁实秋《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1页。

⑤ 徐诵明于11月底赶赴重庆,寻求教育部的支持;李蒸在重庆参加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未归。参见《陈立夫致徐诵明函》(1938年12月15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22页;《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纪录》(1938年10月7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79页。

⑥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组情况报告书》(1939年3月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41页。

⑦ 《本校第五十一次常会议决会春、章友江、曹联亚三先生送薪办法分函查照》(1939年1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4,第118—121页。

⑧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组情况报告书》(1939年3月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45页。

⑨ 曹靖华:《自述经历》,《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第148页;彭迪先:《我的回忆与思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6页。祁鹿鸣等:《1940年前后西北大学的政治情况与地下党的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汉中地区组织及其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2007年编印,第184页。与事隔多年后的回忆不同,彼时的中共地下党则视胡为复兴系之一员,甚至明确说其1938年在汉中加入复兴系胡宗南派,称“胡宗南与蒋介石很看得起他,胡手下无著名学者和教育界中人,因此想重用他”。参见《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91页。





庆大学时,胡即已深知要想大展其能,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有力支持。1935年8月,胡庶华应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之邀任重庆大学校长。在刘湘的鼎力支持下,胡争取到大笔经费,改造图书馆、女生宿舍,增加各系设备,重庆大学面貌大为改观。^① 面对局面更复杂的西北联合大学,胡庶华明白,离开陈立夫的倾力支持,实难有所建树。胡庶华虽几年前即加入CC系外围组织“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任湖南分会总干事,1937年7月10日还参加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三周年纪念暨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与陈立夫同为大会主席团成员^②,但到底非CC中人,论私交,显然与长期追随陈立夫的张北海无法相比。因此,通过张北海疏通与陈立夫的关系,便成为其施政的不二之选。

胡庶华虽然通过笼络张北海疏通了与教育部的沟通渠道,获得陈立夫的认可^③,但并未能赢得西北联合大学内CC系的支持。在一份1939年12月23日的秘密报告中,CC系对胡的作为多有批评,称其“临事着荒[慌],茫无头绪,同志无法追随,诸多生滞”,CC系人士甚至提出CC系主将、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琰与胡对调的设想,称“胡先生习工,学可致用,其理由一也;工学院局面较小,易于控制,其理由二也”。^④

CC系不满胡庶华,是因为他们观察到胡庶华在党与团之间,偏向三青团。

实际上,还在1938年底,胡庶华即厕身党务。12月2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常会”)第106次会议通过改组陕西省党部的决议,胡庶华成为改组后的省党部执行委员。^⑤ 胡认为这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推荐所致。^⑥ 这次会议还通过《筹设各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直属区党部组织办法》,规定专科以上学校设立直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区党部,“已有区党部之学校应即依本办法改组”。^⑦ 半年多后,1939年7月13日第125次中常会决定筹设中央直属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区党部,胡庶华、杨立奎与CC系外围组织诚社出身的法商学院政治系助教赵金铭同为筹备员。^⑧

主持筹备中央直属西北联合大学区党部之外,胡庶华还直接指导三青团在该校的分支机构。1939年6月1日,三青团陕西支团部设立南郑区团部筹备处,派胡庶华为主任,杨立奎为书记,李蒸、徐诵明等人为干事。该区团部下设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南郑、城固、西乡、洋县等六处分团部

① 《四川省立重庆大学二十六年度第七次校务会议纪录》(1937年12月8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大学档案,01200001000210000014000。《呈为恳予慰留博硕宏材而利教育由》(1938年7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1709,第154页。省立重庆大学的经费一直紧张,校政的推行多赖刘湘拨付的临时费。胡庶华曾向财政部申请从四川盐税中每月补助重庆大学2万元,未获部长孔祥熙同意。参见《孔祥熙致胡庶华电》(1937年11月6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大学档案,01200001004840000041000。

②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代表大会今晨开幕同时举行三周年纪念》,《申报》,1937年7月10日,第18版。

③ 1939年8月初,陈立夫推荐胡庶华为三青团首届中央监察会监察。参见《胡庶华致陈立夫函》(1939年9月2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8/140.14-01/0001,第51页;《陈立夫致胡庶华函》(1939年10月5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8/140.14-01/0001,第46页;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80页。

④ 《国立西北各院校中等学校暨南郑城固西乡地方之近况》(1939年12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20,第46—50页。这份资料出自CC系学生白希安等人之手,凡复兴系成员均在姓名后标注“(××)”,是研究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宝贵档案史料。

⑤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〇六次会议纪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⑥ 《胡庶华致朱家骅函》(1939年1月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学校党务:西北联合大学,301/01/06/340,第7页。胡与朱为德国柏林矿科大学校友,胡1913年入读,朱1914年入读。

⑦ 《筹设各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直属区党部组织办法》(1938年12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4册,第335页。

⑧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五次会议纪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6册,第253页。





筹备处。^①11月25日,三青团中央团部直属第十二分团部筹备处成立,胡庶华、刘拓任指导员,杨立奎任筹备处主任,李冰任书记。^②第十二分团部成立之初,统辖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两校团员,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股,每股设股长一人,办事六人。^③

南郑区团部成立以后,胡庶华除“每月津贴一百元外(八月份起),又给三个科〔股〕长薪金,并与师范学院、医学院分函商请津贴五十元(九月份起)”,以支持团部活动。^④而根据《直属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区党部补助费标准》(此时,西北联合大学已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大学区党部每月大概只能从中央党部获得最多100元津贴,也怪不得该区党部要抱怨。^⑤更令区党部气愤的是,胡还自掏腰包赞助三青团的活动,仅1940年4月的华家堡野餐活动,胡就出了200元。^⑥

胡庶华的大力支持,使西北大学的团务很是活跃。1940年1月,中央团部在呈送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二十九年度工作报告》中,称“西北联大”等8校团务“成绩较优”。^⑦

此时的胡庶华,意气风发,在致朱家骅的一封信中,胡说:

弟近来连得两重要义务职,一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南郑区团部筹备主任,一为中央直属西北联大区党部筹备员,均在吾兄指导之下……弟年力已衰,本不应多兼职务,惟中央及兄等与夫此间青年,尚不以弟为老朽昏庸。又值异党在此蠢蠢欲动之际,故不得不勉为其难以副吾兄之望。弟现在一面将过去小组织一概取消,集中党的力量;一面侦察异党行动以资应付。一年以来,幸同志均能努力,一切都有进步。^⑧

党团政一肩挑,如此格局,在国立大学校长中似不多见。

二、首掌西大

1939年8月8日,行政院决定再次改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和医学院

^① 《三民主义青年团南郑区团部即将成立》,《精诚半月刊》第9期,1939年6月15日,第17页;《三民主义青年团南郑区团部筹备处业已成立》,《精诚半月刊》第10期,1939年7月1日,第19页。

^② 《通报本分团部成立经过团址设于城固国立西北大学校内务请热心赞助》(1939年12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工学院档案,61/1/18,第1—2页。

^③ 吴寒钦:《本分团部一年来简史》,《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国立西北大学分团部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12月,第18页。

^④ 《国立西北各院校中等学校暨南郑城固西乡地方之近况》(1939年12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20,第47页。

^⑤ 《直属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区党部补助费标准》(1939年8月2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6册,第401页。1939年中央直属区党部成立前,陕西省党部直属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区党部拥有党员380人。参见《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直属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区党部党员名册》(1939年),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4,第133—183页。

^⑥ 《告胡庶华》(1940年6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151页。

^⑦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二十九年度工作报告》(1941年1月),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5.2/57.1,第106页。此处的“西北联大”实指西北大学。1939年8月8日第二次改组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虽已不复存在,仍有不少人习惯将西北大学称为“西北联大”。如1940年10月25日,蒋介石在给陈立夫的一份手令中便说“西北联合大学风纪如此败坏,为何不设法解散或归并?”参见《令陈敦教西北联大风纪败坏何不解散或归并又朝阳等野鸡大学何复令其存在》(1940年10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一般资料——手令登录(十),002/080200/00561/002/079x。

^⑧ 《胡庶华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2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学校党务:西北联合大学,301/01/06/340,第11—15页。





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与国立西北医学院^①,剩下的文理学院拆分为文学院、理学院,与法商学院组成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胡庶华“因联络张(北海)”而成为第一任校长^②,完成整顿法商学院任务的张北海则被调回教育部。

辛辛苦苦经营一年,胡庶华终于等来独当一面的机会。经过1938年6月、1939年8月两次改组和张北海的整顿,大批教职员相继离去,腾出来的位置不算少,但胡非常清楚自己的腾挪空间有限,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和各学院院长人选便不敢做主。^③

1939年8月11日,胡致电陈立夫,希望张北海留下来担任西北大学总务长。胡还报告,训导长他打算自兼,教务长则留用任该职多年的张貽惠,法商学院拟请著名法学家戴修瓚执掌,如戴不就,再以原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政经系主任尹文敬代替。^④文理学院分开后,理学院院长仍用刘拓^⑤,文学院院长一职,胡先后提出陕西米脂人、教育系教授马师儒和原联大常委陈剑脩两个人选。^⑥

9月5日、7日,教育部连回两电,同意教务、训导两长和法商学院院长人选,不同意张北海留西北大学。同时,教育部特别强调文学院院长要以“西北籍人士充之”,陈剑脩固然不合条件,马师儒虽是西北籍,陈立夫还是觉得资望不足,勉强说“如无较马师儒更适当者,可暂以马代理之”。^⑦

几天后,胡庶华决定以张北海推荐的赵学海为总务长人选。赵是化学系教授,“跟刘拓关系很好”。^⑧而文学院院长人选,胡庶华则提出王凤仪、吴宓、宋联奎三人请教育部挑选。^⑨王凤仪曾任中法大学图书馆主任,吴宓时为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宋时任陕西省参议会议长。三人中除了宋联奎,都是名重一时的陕籍大学者,符合教育部的要求,尤其是王凤仪,还曾在陕西土产的“国立西北大学”担任过教务长。^⑩10月3日,教育部回电指示胡庶华“先聘王凤仪,如不就再聘吴宓”。^⑪

① 《行政院决议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任命胡庶华为校长包可永任闽建厅长》,《申报》,1939年8月9日,第4版。

②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7卷,1939年12月24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张北海致陈立夫电》(1939年8月5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17页。

③ 根据1929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胡庶华本可径自聘任各学院院长,无需请示教育部;教务长、总务长虽无明文规定,1942年前一般也由校长直接聘任,1942年1月教育部才下令各专科以上学校,今后“教务长、总务长应一律由校选荐二人,经部核定一人后聘任”。训导长的情况特殊些,1939年5月《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规定各大学设训导处后不久,教育部即明确训导长需经中央审核方可获任。参见《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1929年7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1),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教育部训令(高字第02772号)》(1942年1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99,第59页;《专科以上学校训导人员资格审查条例》(1939年6月29日),《中央党务公报》第1卷第1期,1939年7月15日,第55—56页。

④ 《胡庶华致陈立夫电》(1939年8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12页。

⑤ 《聘刘拓先生为理学院院长》(1939年8月3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8,第246页。

⑥ 《胡庶华致陈立夫电》(1939年8月23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8/140.14-01/0001,第94—95页;《胡庶华致吴俊升电》(1939年8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6页。

⑦ 《陈立夫致胡庶华电》(1939年9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8页;《教育部复胡庶华电》(1939年9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10页。

⑧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92页。

⑨ 《胡庶华致陈立夫电》(1939年9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3页。

⑩ 《西北大学史稿上卷(1902—1949)》(修订本),第121页。

⑪ 《教育部致胡庶华电》(1939年10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2页。





10月14日,西北大学先给王凤仪发出聘书,王未应聘。^①1940年1月,胡庶华开始接洽吴宓。1月11日,吴宓连接两电,一为胡庶华亲发,一为胡请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所发,均促其出掌西北大学文学院。当晚,吴从1938年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的周榆瑞得知,“西北大学学生横暴。各教授互不相下。胡校长乃一巧宦。其聘宓必为息压争端,示不偏袒。且接洽者必不止宓一人,故切不宜往”^②,曾一度打消去西北大学的念头。但是,几个月后,吴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发生矛盾,6月8日,又在清华评议会评议员选举中落选。6月17日,吴的学生,西北大学外文系副教授盛澄华来函,报告“西北大学仍欲聘宓为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吴“怦然心动”。^③6月21日,吴宓决定接受西北大学的聘请,还托顾毓琇与胡庶华商量月薪和代运书籍的事。^④1940年7月26日,吴宓接到胡庶华的聘电:“本校敦聘先生为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月薪460元,祈惠允,并电复。”^⑤同期,浙大给吴宓开出的薪水只有380元。

7月31日,吴又接到胡庶华的航快函,胡允诺月薪还可“增至五百元,运书可由校支付运费”,但又说“外文系主任不便更动,仅聘宓为文学院院长”,令吴疑窦丛生。就在这一天,吴收到西北师范学院教授、陕西同乡高文源7月26日发出的航快函,内中说:“胡去西大不能即时平静,胡留则必有轩然大波”。高劝吴宓“先接聘书,暂缓到校,俟过二三月,局势澄清,再临城固,则一方固可慰同乡期盼之殷,为陕西人争一名誉地位;一方又可免除麻烦。迟迟其来,最为妥当。”一听此讯,吴宓“决留此不动,西北、浙大两皆不赴矣”。^⑥

8月1日,西北大学发出下学年“教学第壹号”聘书,敦请吴宓“为本大学文学院教授兼院长”。^⑦两天后,吴宓致电胡庶华,“聘约敬辞,另函复谢”。4日,吴宓致函胡庶华,“先述拟就之意。次以学校风潮及外文系主任靳不余畀,知遇难言,之二理由,敬辞不往”。写完后,吴自己都觉得该函“语颇激昂”。5日,吴宓接到盛澄华的长函,“述西北内情及接洽经过”,展读之下,吴宓才知道“胡校长地位甚稳固,反对者实无理”,更重要的是“胡校长对宓聘请亦出诚意。外文系主任不动亦是暂局。盼宓即往”。吴宓又觉得自己“过信高文源函中一面之辞”,在昨天的函中“盛气激辞,几于胡挥斥凌夷之”,但“已悔之不及”,“只有安心留联大”一途了。^⑧

吴宓与胡庶华接触之初即对西北大学“党化教育情形”之恶劣有所耳闻^⑨,在与胡庶华密切接触的六七月份,正是西北大学反胡力量活动最猛烈之时。延绵不绝的剧烈内斗不仅令吴宓这样与西北大学素无瓜葛的名教授视之为畏途,即便与其渊源极深者,也踟躇不前。戴修瓚是北平大学的

① 《聘王凤仪为文法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39年10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5,第65页。根据目前的档案资料,只知王凤仪最终未来应聘。至于王未应聘之原由,据其同学之子王志新的回忆,是因为王触电身亡。王志新原文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接西安信,来庭(王凤仪的字——引者注)先生于发表为西北联大文学院院长后,因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事务待理,二次莅平。此在世界花都法京巴黎生活12年之老博士,竟以触电身死闻矣!”(参见王志新《我所知道的王凤仪博士》,《户县文史资料》第7辑,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52页)王志新1937年后未再见过王凤仪,所述王凤仪1937年后情事均系耳闻,如称王1938年春接到聘约,便与档案记载相左。有鉴于此,笔者对王志新此说存疑。

②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7册,1940年1月11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页。周榆瑞系北平师范大学学生,毕业后经吴宓介绍到西南联大外文系任助教,其简介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

③ 《吴宓日记》第7册,1940年5月20日、6月8日、6月17日,第170、176、179页。

④ 《吴宓日记》第7册,1940年6月21日、6月30日,第181、185页。

⑤ 《吴宓日记》第7册,1940年7月26日,第199页。

⑥ 《吴宓日记》第7册,1940年7月31日,第202页。

⑦ 《国立西北大学聘书教学第壹号》(1940年8月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79,第24页。

⑧ 《吴宓日记》第7册,1940年8月4—5日,第204—205页。

⑨ 《吴宓日记》第7册,1940年3月10日,第140页。





老人,1934年即为该校名誉教授^①,也与教育界CC系诸要员陈立夫、吴俊升颇有交情。张北海决定离开西北联合大学后,戴成为教育部和西北联合大学都能接受的法商学院院长人选。西北联合大学第二次改组前,徐诵明曾邀请戴修瓚主持法商学院院务。^②聘戴执掌法商学院的决定虽然得到校内CC系的支持,却遭到复兴系的反对。^③戴大概是听到了风声,加之西北联合大学自成立起即内外纠纷不断,故对这一邀请颇为犹豫。^④1939年7月10日、19日,西北联合大学三常委联名电催戴“飞校主持”。22日,戴修瓚终于下决心接受邀请,告之将于25日到重庆,再飞陕就任。^⑤不料8月8日教育部下令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剩余部分改组为西北大学,以胡庶华为校长,徐诵明以下北平大学旧人纷纷离开城固。恰在此时,戴修瓚唯一的女儿“突患盲肠炎,卧病医院”,其妻“身体素弱,因忧成病,迭电促归”。戴返回昆明后正好借此推掉聘约。^⑥

尹文敬也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抉择。尹文敬,字伯端,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1933年应聘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北平大学南迁与他校合组为西北联合大学后,尹一度成为法商学院院长的热门人选。1938年上半年,尹竞争院长未果,自觉“在联大之处境困难”^⑦,写下“无力培桃李,何心恋稻粱”的诗句,避走四川。^⑧8月,尹受邀到中央政治学校任教。^⑨12月20日,尹致函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拟请钧会准予休假一年,俟本学年暑假后再行回校服务”^⑩,得到批准。

尹只是请假而非辞职,且此前“联大同仁有邀伊返校之表示”^⑪,所以尹在西北大学自有其地位。1939年8月31日,胡庶华执掌西北大学后,手书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名单,唯一列入名单的系主任便是尹文敬。^⑫9月12日,胡庶华致电尹文敬的弟弟、时在成都地方法院任职的尹文宽,请其转告尹文敬,“本校聘兄为经济系教授兼主任,聘书存校,祈即命驾”。^⑬9月底,听说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不允尹离开,胡庶华还转托陈立夫“商请果公准尹请假一年”,回西北大学任教。^⑭不

① 《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一览(民国廿三年度)》,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5年编印,第215页。

② 《李蒸、徐诵明、胡庶华致戴修瓚电》(1939年7月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7,第11页。原电草稿中三常委的签名,徐诵明、李蒸均为亲签,胡庶华由徐诵明代签。(胡庶华从6月5日起请假三周,但实际直到6月28日仍未出席79次常委会,在7月5日的80次常委会才出现)按惯例,戴为北平大学旧人,是否聘请其来西北联大,原北平师大校长李蒸不会插手,故很可能是徐诵明决定发出这一电报。

③ 《邓季直等致陈立夫电》(1939年7月6日收电),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97页;《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31页。

④ 《李蒸、胡庶华、徐诵明致戴修瓚电》(1939年7月1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7,第25—27页。

⑤ 《戴修瓚致李蒸、胡庶华、徐诵明电》(1939年7月2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6,第115页。

⑥ 《戴修瓚致吴俊升函》(1939年8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17—19页;《吴俊升致胡庶华电》(1939年9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15页。

⑦ 《周炳琳致徐诵明、李蒸、胡庶华、许寿裳、张北海函》(1938年12月1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4,第71页。

⑧ 尹文敬:《莘氓短什吟》,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⑨ 《周炳琳致徐诵明、李蒸、胡庶华、许寿裳、张北海函》(1938年12月1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4,第71页。

⑩ 《尹文敬致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函》(1938年12月2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4,第46页。1938年8月,尹离开西北联合大学时并未辞职,也未被解聘。参见《为呈复奉发二十七年渝漾7742密代电声述情形请鉴核》,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66页。

⑪ 《周炳琳致徐诵明、李蒸、胡庶华、许寿裳、张北海函》(1938年12月1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4,第71页。

⑫ 《胡庶华手书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名单》(1939年8月3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8,第298页。

⑬ 《胡庶华致尹文宽电》(1939年9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5,第167页。

⑭ 《胡庶华致陈立夫电》(1939年9月27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6,第149页。





久,胡庶华听李宜琛说,“君亮(戴修瓚的字)、伯端闻此间平静,有可来之意”^①,马上再电尹,催其速来。^②但尹文敬心有余悸,迟迟下不了决心。

戴修瓚、尹文敬拒绝应聘,胡庶华只好自兼法商学院院长,直到1940年3月原北平大学老教授刘鸿渐答应暂时代理。^③

学院院长、三大处首长等关键职位人选的决定权固不在手中,便是教员聘任,胡庶华也不得不谨慎从事。1939年8月31日,胡庶华手书一份留任原法商学院教员名单如下:

聘王治焘先生为法律系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聘李宜琛先生为法律系教授,月薪三百四十元;聘王璈先生为法律系教授,月薪三百四十元,聘刘毓文先生[为]法律系副教授,月薪二百二十五元;聘曹国卿先生为经济系教授,月薪三百二十元;聘季陶达先生为经济系教授,月薪三百二十元;聘汪奠基先生为法商学院教授,月薪三百二十元;聘康伦先先生为经济系专任讲师,月薪一百六十元;聘于鸣冬先生为经济系讲师,月薪二百元;聘孙宗钰先生为商学系教授,月薪三百二十元;聘徐褐夫先生为商学系教授,月薪三百二十元;聘赵树勋先生为商学系教授,月薪三百元;聘高维翰先生为商学系讲师,月薪一百八十元;聘李毓珍先生为商学系助教兼讲师,月薪一百一十元。^④

这份名单中,既有CC系的重量级教授李宜琛、孙宗钰,也包括“素持反对中央之态度”而一度传出要被解聘的季陶达。教员聘任事关生存,为避免动荡,无论什么政治立场,“除自动不干者外”^⑤,胡还是尽量留用。

当然,胡庶华深知,聘任教员、特别是教授,是校长重建权力系统的关键环节。胡庶华来城固一年,完全清楚自己最大的罩门是“没有群众”^⑥,基础薄弱,因此,一方面留任原有教员,另一方面也借着大学改组、需要新聘教员的机会,打造嫡系队伍。1939年9月7日,胡庶华聘其湖南同乡、上海炼钢厂时的下属、原重庆大学党义教授杨柏森为文学院、法商学院两院教授^⑦,10月10日,又令其兼教务处注册组主任。^⑧9月13日,胡聘其武昌大学时的学生、重庆大学时的部下段子美为数学系教授兼校长室秘书。^⑨出纳组主任王道灿也是胡任重庆大学校长时的旧部。^⑩

① 《胡庶华致陈立夫电》(1939年10月1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5,第72页。

② 《胡庶华致尹文敬电》(1939年10月1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5,第204页。

③ 《胡庶华致陈立夫电》(1940年3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138页;《陈立夫致胡庶华电》(1940年3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137页。

④ 《胡庶华手书法商学院聘任教员名单》(1939年8月3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8,第214页。

⑤ 《胡庶华致陈立夫函》(1939年9月2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8/140.14-01/0001,第49页。

⑥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47页。

⑦ 《聘杨柏森为文法两院教授》(1939年9月7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5,第137页。杨的经历见《张貽惠等告胡校长》(1940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93页;《关于聘用周君适、杨柏森、沈曼陶、郭坚白的便签》(1935年9月2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大学档案,01200001001280000158000。

⑧ 《胡庶华令聘杨柏森的便签》(1939年10月1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5,第20页。

⑨ 《聘请段子美为数学系教授兼秘书》(1939年9月1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0,第12页。《四川省立重庆大学二十六年度上期第一次校务会议纪录》(1937年9月29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大学档案,01200001000210000001000。

⑩ 《告胡校长(不具名)文理法商三学院教授三十二人》(1940年6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164页。王道灿曾任重庆大学电机系助教,参见《四川省立重庆大学一九三八年度聘委教职员姓名册》,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大学档案,0120000100116000139000。





教员的聘任与职位的更动,也引起学校各派政治势力的骚动。1939年12月5日,法商学院政治系代主任张宗元辞职^①,11日,胡庶华决定以汪奠基代之。^②只因传说汪升任系主任为国民党复兴系杨立奎所荐^③,CC系人马便大为不满,发动学生罢课。胡庶华没办法,把赵金铭和三青团分团部干事王大鹏召到办公室,商定“以王治焘为政治系主任,李宜琛(我方)先生为法律系主任,双方均不得再有举动”。^④实际上,汪系张北海力聘而来。1938年12月,汪接到聘书后“由桂转滇”,再“由滇而筑而渝而蓉”,历尽艰辛,直到1939年2月底才到南郑。^⑤到校后,汪只因为杨立奎所“利诱”^⑥,便被CC系打入另册,群起而攻之。

从1939年9月初开始,国立西北大学的聘书便源源不断地发往各地,到9月底10月初达到高潮,10月2日一天便发出五份聘书,分别聘请胡自翔任商学、经济两系教授;聘刘之谋为法律系教授,10月18日,又加委其为法律系代主任;聘黄宪章为经济系教授;聘曾约农为外国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聘原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周谦冲为历史系教授兼主任。^⑦一直到12月,聘书还在陆续发放中。

西北大学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其正式名称依然为“中共联大党支部”)虽然对教职员聘任无法置喙,不再有抗战初期“一切活动都归我党领导”的风光^⑧,仍掌控着为数众多的学生社团、活动小组,在学生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1938年秋到1939年暑假期间,中共学生党员和左翼学生先后成立展望社、自励社、自修社、自学社、译丛社、学习社、剪辑社等公开半公开的社团和《资本论》学习研究小组,直接参加社团的学生至少有50人。这些社团通过出版《展望》《自励》《学习》《剪辑》等壁报,翻译苏联报刊、书籍,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中共学生党员和左翼学生多结伴租住在法商学院附近的仁义村,社团、小组的活动地点就设在住所,这里也因此被称为“赤色区域”。中共学生党员和左翼学生依主义而居,共享约近百册社会科学、新文艺方面的书籍和《新华日报》等几份报纸,形成一个内聚力很强的圈子。^⑨

对于胡庶华这样“没有群众”的校长来说,具有高度组织力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及其外围社团、受中共影响的左翼学生自是小觑不得。胡庶华和他的班底完全清楚这一点,有意在国共冲突中充当缓冲阀,争取这部分“群众”。

① 《张宗元致胡庶华函》(1939年12月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71,第66页。胡庶华直到12月9日才手书便条“张宗元先生辞代政治系主任职,应照准”。参见《胡庶华手书准张宗元辞职的便签》(1939年12月9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5,第6页。这与胡雷厉风行的作风不符,显示出胡在考虑由谁来接任政治系主任时颇为犯难。

② 《胡庶华令聘汪奠基的便签》(1939年12月1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5,第42页。

③ 档案原件中有“十二月十三日发表汪奠基为政治系主任(杨之推荐)事”,此处的“杨”据上下文推断当指杨立奎。参见《国立西北各院校中等学校暨南郑城固西乡地方之近况》(1939年12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20,第48页。

④ 《国立西北各院校中等学校暨南郑城固西乡地方之近况》(1939年12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20,第49页。

⑤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纪录》(1938年11月3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97页;《张北海致联大常务委员会函》(1939年2月2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4,第106页。

⑥ 《国立西北各院校中等学校暨南郑城固西乡地方之近况》(1939年12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20,第47页。

⑦ 《聘周谦冲为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10月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8,第40—55页。

⑧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40页。

⑨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48页;祁鹿鸣等:《中共西北地下党支部的战斗经历》,《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1辑,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1987年编印,第17—18页。





1940年2月,中共地下党支部幕后领导的西北大学女同学会举办座谈会,国民党西北大学区党部请胡庶华予以取缔。胡不仅未予取缔,反而出席会议,令区党部一班人大为恼火,直斥其“投机取巧”。^①4月13日,民先队队员王佐才、江效楚、杨文杰将自习室8套桌凳搬到仁义村民先队机关使用。^②理学院院长刘拓代为主持的第20次校务会议议决开除这三名学生的学籍。^③校长秘书段子美拒不张贴处分布告,胡庶华回校后也拖着不办,后来虽然迫于区党部与三青团的压力,开除三人,但同时发给肄业证书,便于其转学。^④法商学院学生苏少兰、史凌云一学期中请假已超过五分之二,教务长张貽惠“照章令其休学”,“该生等旋向胡氏说项,竟蒙允准补考,并保证不予留级处分”。在张貽惠领衔公开署名的告状信中,此事的性质无非是“破坏校规”,另外几封匿名告状信则特别指出苏、史二生是民先队队员,胡庶华此举“欲借此拉拢之也”。^⑤胡庶华对左翼学生网开一面的做法,中共心知肚明,他们评价道:“学生运动只要不妨害到他,可以不管。”^⑥

经过半年的周旋,到1940年初,各处、院、系负责人基本到位,缺额教员大多补齐,左翼学生与校方相安无事,CC系虽然对胡庶华颇为不满,也还未付诸行动,校内一片平静,西北大学总算步入正轨。4月29日,教育部公布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名单,西北专科以上学校中,只有胡庶华一人名列其中。^⑦胡庶华似乎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正坐在火山口上。

三、铩羽而去

胡庶华虽然努力搭建自家班底,但奋斗数月,除了亲兼的训导长外,总务、教务两长和文、理、法商三院长未能拿下一职,各系主任也多是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旧人。反倒是理学院院长刘拓^⑧,同事、故交遍布学校各个角落,又因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即加入CC系外围组织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张北海离开城固后,成为CC系的领袖。1940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直属西北大学区党部选出第一届执监委员,白希安、田崇礼、刘兆珍、冯鸿藻、王协邦当选为执行委员,吴曙曦、李立家为候补执行委员;胡庶华当选为监察委员,刘拓当选为候补监察委员。^⑨除胡庶华外,

① 《告胡校长(不具名)文理法商三学院教授三十二人》(1940年6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171页。关于西大女同学会,参见王仲雄《我走过的路》,《成都现代革命史资料》1984年第2期,第6—7页。

② 《告胡庶华》(1940年6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149页;《告胡校长(不具名)文理法商三学院教授三十二人》(1940年6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169页。

③ 《国立西北大学第七次校务会议纪录》(1940年4月2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43,第21页。胡庶华4月10日赴重庆,此时尚未回校。

④ 《告胡校长(不具名)文理法商三学院教授三十二人》(1940年6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169页。

⑤ 《张貽惠等告胡校长》(1940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104页;《告胡庶华》(1940年6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157页。

⑥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92页。在这份材料中,中共党员称胡庶华“坚持开除”江效楚、王佐才、杨文杰,他们实不知胡庶华是打算不开除的,只不过没坚持住。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50页。

⑦ 重庆《教育公报》第12卷第8期,1940年5月30日,第7页。

⑧ 刘拓1926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此后长期担任该校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30年7月12日兼北平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1934年5月前任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干事,1934年5月任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第二民众学校校长,1941年3月4日当选西北大学区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1942年5月11日前后离开西北大学。

⑨ 《为直属西北大学区党部选举执监委员一案请查照转陈备案并颁发印信暨当选证明书由》(1940年9月2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5.3/160.12。





多属 CC 系。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旧人越来越不满胡,CC 系控制的区党部又在一旁虎视眈眈,西北大学暗潮涌动,各方都在等待时机。

表 1 国立西北大学区党部第一届执监委员简况表^①

职别	姓名	年龄	性别	籍贯	简历	派系
执行委员	白希安	25	男	河南武安	法商学院法律系四年级学生	CC
	田崇礼	26	男	河北霸县	理学院化学系四年级学生	CC
	王协邦	24	男	青海湟源	理学院数学系三年级学生	CC
	刘兆珍	26	男	河北宛平	图书组员	不详
	冯鸿藻	25	男	河北昌黎	法商学院商学系学生	CC
候补执行委员	吴曙曦	26	男	湖南长沙	法商学院政治系学生	CC
	李立家	23	男	山西崞县	理学院化学系学生	不详
监察委员	胡庶华	54	男	湖南攸县	校长兼训导长	
候补监察委员	刘拓	40	男	湖北黄陂	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	CC

1940 年 6 月 7 日,陈立夫率行政院政务巡视团抵达南郑。8 日,陈立夫留团员在南郑,自己到西北大学视察。^② 西北大学反对胡庶华的力量,趁此机会上书陈立夫,要求撤换胡庶华,一两日之间,陈立夫收到 6 封告状信。分量最重的一封告状信由资历最为深厚的教务长张貽惠领衔^③,列名其中者包括法商学院代院长刘鸿渐、法律系主任李宜琛、经济系主任曹国卿、理学院数学系主任赵进义、生物系主任雍克昌、文学院历史系主任陆懋德、代理总务长赵学海等一大批 CC 系成员、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旧人。这封信列举胡庶华 12 个“乖谬万状”的“施为”:办事外行、不识大体、援引近倖、树封建势力、开支不当、用人不胜任、失地方信仰、违反部令、破坏校规、功课残缺、教授不足、引新排旧,将攻击的火力集中于胡庶华的用人政策上。他们指责胡“一意援引乡人”,造成西北大学“湖湘子弟满天山”的局面。信尾,一众教授诘问:“今日何日? 陕西何地? 大江以北院系最备、员生最多者,尚有几校? 国家对此校如何重视,国民对此校如何属望,而胡竟一味倒行逆施,斫丧国本,可堪痛心!”他们请求陈立夫为西北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西北计,将胡“撤职或调置闲曹”。^④ 由区党部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 5 人联署的告状信,除了呼应教授们的指责,更强调胡庶华为

^① 《国立西北各院校中等学校暨南郑城固西乡地方之近况》(1939 年 12 月 23 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20,第 53—54 页;《国立西北大学区党部执监委员名单》,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 5.3/160.12;《董典秋致陈立夫函》(1944 年 7 月 27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 340—343 页;《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 年 8 月 24 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8,第 83 页。

^② 《政务视察团日内抵省》,《秦风日报》,1940 年 6 月 10 日,第 2 版。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写为 7 月,有误,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 1994 年版,第 321 页。

^③ 张此时在重庆。

^④ 《张貽惠等告胡校长》(1940 年 6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 88—114 页。在这封告状信上署名的教职员共 25 人,除上述 7 人外,有据可查的 CC 系成员尚有 6 人。参见《国立西北各院校中等学校暨南郑城固西乡地方之近况》(1939 年 12 月 23 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20,第 63 页;《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 年 8 月 24 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8,第 89—108 页。





“巩固一己之位置”而“操纵党团”,挑动党团斗争,“直接坐享渔利,间接为害党国”。^① 还有几封未署名的告状信强调的则是“胡氏处处培养复兴势力”,对杨立奎、汪奠基、李冰等人唯命是从,而“对于本党忠实同志,无不设法牵制”。^②

胡庶华到陕西两年,特别是独掌西北大学校政一年,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旧人中也培养了一些支持者。胡的湖南同乡、原北平师范大学老资格的教授黎锦熙便出现在挺胡名单中。更大的支持群体则是胡庶华一手拉进西北大学的嫡系。6月11日,杨柏森、王道灿、段子美、刘之谋、唐祖培等人行动起来,上书陈立夫,称颂胡庶华执掌西大“时期虽短,而成绩斐然,且遇事均遵照部令及部长指示秉公办理,不私不苟,苦干实干,其苦心孤诣,师生莫不感动”,直斥告状者为“别抱私图者”。^③ 三青团学生也纷纷致电教育部,“誓死反对刘拓、张貽惠等学棍长校”^④,直指反胡运动的后台老板是理学院院长刘拓。

6月27日,胡庶华还亲自去西安活动。直到7月26日,在支持者看来,“胡校长地位甚稳固”。^⑤ 胡庶华虽然也知道告状者如云,但似乎也没感到有多大的危险,8月1日,仍按常规发出下学期聘书,聘任吴宓等73人为西北大学教授、副教授,谭文伯等35人为讲师或助教,高明堂等75人为各部门职员,委黎锦熙为总务长。^⑥

然而,接到对立双方的这7封信后,陈立夫已考虑撤换胡庶华。自胡庶华1939年下半年执掌西北大学以来,教育部便不断收到告状函电,要求胡庶华下台,陈立夫均置之不理。这一次反胡师生遍及文、理、法商三学院,除理学院院长刘拓隐身幕后外,多数现职院长系主任均列名其中,参与人员之多、分量之重,前所未有,令陈立夫不得不另做打算。

8月29日,行政院第479次会议议决,“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应与国立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对调任用”。^⑦ 9月14日,教育部发出校长对调的训令,但西北大学直到25日才收到,签收文件的已是代理教务长身份代理校长的王治焘。^⑧ 此前,消息早已传开,焦急的胡庶华不得不于13日致电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询问对调令何时发出。^⑨ 23日,胡庶华终于收到教育部的回电,要求其“来渝转赴新任”。^⑩

得到确切消息后,胡庶华很快做好动身的准备。9月24日,胡庶华离开鏖战了两年多的西北

① 《为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氏荒陲校政不尽职尽责废公营私阻碍党务恳请另任贤明以利党教事》(1940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121—127页。

② 《胡校长校务劣迹详单》、《告胡校长(不具名)》(1940年6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151、177页。

③ 《刘之谋等保胡庶华》(1940年6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115—116页。

④ 《张正谊等致陈立夫电》(1940年10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35页。

⑤ 《吴宓日记》第7册,1940年8月5日,第205页。

⑥ 《敬聘吴宓先生等七十三人为本大学教授或副教授》(1940年8月1日)、《兹聘谭文伯先生等三十五人为本大学讲师或助教》(1940年8月1日)、《兹委派高明堂先生等七十五人为本大学职员》(1940年8月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79,第1—27页。

⑦ 《行政院决议广西大学校长由雷沛鸿继任胡庶华调任湖大校长严立三免代鄂省主席》,《申报》,1940年8月29日,第4版。

⑧ 《教育部训令(总字29869)》(1940年9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78,第2页。此前,教育部已于9月12日致电胡庶华,通令对调,但在西北大学档案中未发现该电。参见《教育部致湖南大学皮校长、西北大学胡校长电》(1940年9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121页。

⑨ 《请电示对调部令发出日期》(1940年9月1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78,第54页。

⑩ 《教育部致胡庶华电》(1940年9月19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78,第78页。训令系正式文件,一般用航空邮件寄出,加之西北大学偏处陕南,需时较电报长得得多,故教育部9月19日发出的电报反而比9月14日发出的训令先到西北大学。





大学^①,转道重庆,踏上第二次执掌湖南大学校政的道路。经过重庆时,一肚子怨气的胡不忘到蒋介石那里参上一本,说这次风潮完全是“某院长有愿为校长阴谋”,而“加庶华以重团轻党之罪名”向教育部控告的结果。^②

这一安排也大大出乎刘拓的意料。早在8月19日,刘拓即通过城固县长丁耀中之口明示教育部:“胡校长措置失当,偏重一方,刘杰[拓]院长众望所归。”^③眼见成功在望,半路上却杀出个皮宗石,刘拓如何甘心?9月15日,刘拓发动刘亦珩等北平来的老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请部令胡庶华“速即离校,校务暂时由校务会议维持”^④,又鼓动国民党西大区党部骨干李立家、王邦协、孙振声等致电陈立夫,“请钧部即速电胡离校,撤换声名狼藉之皮某,以遏乱源,另派硕学重座,以挽危局”。^⑤10月12日,刘拓更是亲自出马,联络重量级教授赵学海、刘鸿渐、赵进义、蓝文征、李宜琛等90人,致电陈立夫,请求派张貽惠回校主持校务,“如张君不来,即请另行派人长校,以免酿成严重事态”。^⑥此前,刘拓还以退为进,放风要离开西北大学。^⑦

陈立夫即便不知道谁合适做西北大学的校长,但完全清楚在两军对垒之际,刘拓不适合坐在这个位子上。10月中旬,眼见原来任命的校长皮宗石迟迟不就职^⑧,陈立夫有了新的考虑。^⑨10月23日,陈立夫下令,“西北大学校长皮宗石未到任前派本部参事陈石珍代理”。^⑩11月22日,就在代理校长陈石珍就职的当天,老部下段子美、杨柏森、王道灿联名向已就任湖南大学校长的胡庶华打电报:

部派陈石珍参事代理校长,今日到校接事,大体移交完毕。^⑪

20余天后,杨柏森也辞职离开西北大学。^⑫

余 论

“没有群众”本是中共党员对胡的评价,虽然用的是中共革命理念,却传神地描摹出胡庶华在担任西北联大校委会常委特别是任西北大学首任校长期间的处境。“群众”之有无、多寡,本应是政治家操心的事,无关大学校政。不过,自从1920年前后政党进入大学,学生运动转为“运动学

① 《胡庶华致陈立夫电》(1940年9月2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78,第8页。

② 《蒋中正致陈立夫电》(1940年11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61页。

③ 《丁耀中致陈立夫电》(1940年8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77页。

④ 《刘亦珩等致陈立夫电》(1940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277页。

⑤ 《李立家、王协邦、孙振声等致陈立夫电》(1940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275—276页。

⑥ 《刘拓等致陈立夫电》(1940年10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280页。

⑦ 《教育部致刘拓电》(1940年10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5629,第68—70页。中共地下党对刘拓1940年9—10月间发起的一波又一波反胡拒皮运动印象深刻,近一年之后还清楚记得刘拓“想活动西大校长”,“活动很厉害”。参见《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83页。

⑧ 胡庶华离开后,皮宗石虽经西北大学、教育部一再催促,还是放弃到城固任职,而是选择在其老长官王世杰名下当一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见王世杰著,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40年12月23日,第316页。

⑨ 约在10月16—18日间,陈立夫已确定西北大学校长的新人选。参见《吴俊升签呈》(1940年10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92—93页。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553(1),第68页。

⑪ 《段子美、杨柏森、王道灿致胡庶华电》(1940年11月2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76,第44页。

⑫ 《陈石珍手书有关杨柏森支薪的便签》(1941年2月7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81,第149页。





生”后^①，“群众”之有无、多寡就和校政紧密相关了。政党进入大学校园后，校长要面对的，不只是教师、学生凭借非政治性人际网络，诸如地域、师生、毕业院校等形成的群体，还有依靠政党组织在一起的师生。这其中尤以国民党大学直属区党部的设立对大学校政的影响直接、巨大。

自192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民党多以党员所在机关如学校为单位，发展党员，设立基层党部，位于革命中心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是如此，受国民革命波及的上海大夏大学也是如此。^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改以前的做法，以居住地而非所在机关为单位划分基层党组织。1928年5月17日通过的《区分部划分办法》规定：“凡有职业之党员如机关之职员、学校之学生或教员、工厂之职员或工友，须依各该党员所寓住址划归各该所属区分部，不得以其职业机关所在地而定其所属之党部”，以免党部“形成特殊阶级性”。^③同年6月25日通过的《区党部划分办法》也规定：县辖区党部“参照地理交通及地方行政区域（如乡镇等）划分之”，特别市及市辖区党部“以地段及区分部数目为划分标准”，只有“在某一门牌内党员在三百人以上，区分部达十个以上时（如学校、工厂以及其他特殊机关），经上级党部允者，得按照特殊情形划为一区党部”。^④不过，除中央政治学校外，这样的特例并不多。^⑤这样的基层党部既有大学师生，也有当地居民，难以团结一致，加之所属层级低，党部活动不易得到党国要员的支持，战斗力便有限。在这样的情形下，党部的运作可能“予学校行政及学生学业有所妨碍”^⑥，却难以对大学校政有实质影响。

1938年底国民党中央决定在专科以上学校设立直属区党部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因直属区党部成员均为在校师生，负责人又多为有地位的教授，这样的负责人要是如西南联大的姚从吾便罢，要是如刘拓那样有抱负、有野心，在其组织下，党员师生很容易“形成特殊阶级性”，党部难免成为其手中的利器，党部网络再与大学原有的非政治性网络叠加在一起，对大学校政的杀伤力可以想见。

胡庶华到达城固县城时，西北联大虽尚未成立中央直属区党部，完全由大学师生组成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直属区党部却已存在3个月有余。不仅如此，西北联大还有闻名全国的左翼师生群体。区党部一方面固然如蒋介石希望的那样，“发挥实际作用”，成为对付中共和左翼师生的利器^⑦，另一方面内部各派系之间也围绕校政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

面对政治化的大学，胡庶华也只好用政治家的手段推行校政。为此，胡庶华一方面在原有权势格局中挖掘资源，依托国民党中的复兴系和三青团抗衡CC系，另一方面引进乡党、旧部、学生，建立新的“群众”基础。同时，胡庶华也尽力争取国民政府要员的支持，除继续走上司陈立夫的路线，也不忘巩固与留德同学朱家骅的关系。

然而，胡庶华努力两年，到底还是被西大旧人依托国民党CC系力量挤了出去。梳理胡庶华执

①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27页。

② 《上海市四区分部雷荣建致上海执行部》（1924年11月1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环龙路档案，环09783。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册，第287页。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5册，第131页。

⑤ 1937年6月，中央组织部提出，中山大学“党员人数甚多”，希望援中央政治学校成例，成立直属区党部，“由中央直接指导”，遭中常会搁置。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1册，第313页。笔者在一份《浙江省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党义公民教员聘定报告书》（1936年10月）中，看到“浙江大学直属区分部”字样（参见浙江省档案馆藏缩微胶卷，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4136，第1—2页），但未能找到其他证明材料，故对抗战前浙大是否有直属党部（包括区党部、区分部）存疑。

⑥ 《为该校区分部工作时予学校行政及学生学业有所妨碍，究竟学校与党部应如何交接请明示由》（1930年10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档案，七二二（1）/1255。

⑦ 《蒋中正日记（民国二十八年）》（非卖品），1939年3月3日，台北，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2015年编印，第33页。





掌西北大学的短暂历程可以发现,大学不仅仅是国共竞争的场所^①,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影响的也不仅是教授们的政治态度^②,而是威胁到大学校政的运行。校缘与党派力量的结合成为左右胡庶华时期西北大学校政走向的关键因素,区党部沦为争夺校政控制权的工具。

[作者陈钊,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医》出版

杨善尧著,台北“国史馆”2015年12月出版,11万字,216页,200元新台币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的医疗状况,与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关系匪浅,然而迄今军事史的研究者们对此问题的关注仍然不够;而在方兴未艾的医疗社会史大潮中,关于军队医疗的研究也明显相对薄弱。2015年末,台湾政治大学杨善尧博士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军医》出版。这样一本以战时军队医疗系统、军队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开启了这一领域的新篇章。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医》共分五章,重点讨论了战时军医行政单位与教育体系、抗战前后蒋介石对于军医制度的规划、战时伤兵的救护和处置等内容。不难发现,上述内容虽然各有侧重,但明显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

第二章论述的战时军医体系,是全书的开端,梳理了军医系统自清末以来的发展历程,将战时军医行政系统和教育机构的基本架构和发展轨迹做了简要介绍,使读者对战时军医制度有一个基本了解。第三章重点讨论蒋介石对军医制度的规划,则侧重于探究在制度设计层面,谋国者和当局者对于军队医疗的设想和论争,是第二章内容的深入,说明了战时军医体系建构、演进的内在逻辑。第四章,则试图考察上述一套制度实际开展的情况和运行的效果,而其重点是伤病兵的处置和管理。这些内容,是前两章讨论的延续。

由于采用了专题式的篇章结构,作者摆脱了既往制度史常见的平铺直叙、就事论事地谈各个机构的设置和功能的演变,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力求揭示战时军医体系中纷繁复杂的面相:军医署所属各单位和红十字会推动的卫生勤务训练所这两套机构长期并行,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战时的作用又有何差异性?德日、英美两大军医派系对于军医制度的设想分歧不断,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其对立和融合对于战时军医机构和军队医疗产生了何种作用?军队对于伤兵管理情况不佳,以至于伤兵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那么战时军队医疗的实际效果又当如何评价呢?对于上述问题,作者在论述中皆尝试进行了回答,且不乏新见。

该书在材料方面,作者以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为主,参酌了海峡两岸典藏的相关档案和资料,并使用了担任军医者的口述访问与回忆录。其中不少史料,过去大多埋在卷帙浩繁的档案和资料集中,甚少被人所提及。由于作者选择了新的题目尤其是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史料因之才首度被发掘和利用。本书史料详实具体,具有较高的价值。(陈默)

① 吴国泰(胡国台):《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校园斗争》,萧秋等:《国外学者评中国共产党》。

② 桑兵:《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

